

《南都学坛》汉代文化研究论文集（十一）

（2004 年第一期——2004 年第六期）

南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目 录

汉代南阳的交通地理形势

——兼论诸葛亮躬耕南阳的战略选择·····	王子今	(1)
论诸葛亮躬耕“陪京之南，居汉之阳”说·····	王建中	(9)
诸葛草庐南阳襄阳之争的形成和发展·····	张晓刚	(15)
汉代县衙署建筑格局初探·····	邹水杰	(20)
从秦汉时期造船业看水军战船及后勤漕运保障·····	上官绪智 温乐平	(25)
汉代羽化图像的发展及其原因·····	杨孝鸿	(30)
汉画像乐舞百戏的表演艺术及其影响·····	冯建志	(35)
韩信“背水阵”胜因新探		
——古代兵法与经典战例考察札记之一·····	黄朴民 张 琼	(37)
汉代江南铜镜文化·····	王福昌	(42)
东汉初年和末年人口数量·····	袁延胜	(46)
南阳汉画像石乐舞题材的双向审美效应·····	王 蕊	(52)
光武君臣以史为鉴论·····	王云度	(55)
汉水流域与秦汉王朝的兴盛·····	马 强	(59)
汉画舞蹈的艺术特征及其影响·····	刘 柳	(65)
南阳汉画的美术学价值·····	杨 伟	(67)
论秦汉法律的适用时效·····	孟志成	(69)
战国秦汉时期舍人试探·····	沈 刚	(73)
荀悦对儒学思想的贡献·····	杨金运	(77)
汉画中的虎崇拜·····	戴建增	(83)
汉画中的农事习俗·····	李真玉	(85)
汉代的罚金和赎刑		
——《二年律令》研读札记·····	高叶青	(87)
论班固的风俗观·····	党 超	(100)
《白虎通义》中的道德意识·····	向晋卫	(107)
汉画的乐舞艺术·····	冯振琦	(112)

汉代南阳的交通地理形势

——兼论诸葛亮躬耕南阳的战略选择

王子今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5)

摘要:南阳在汉代具有重要的交通地理地位。以南阳为一端,联系关中平原和江汉平原的武关道,春秋战国以来已经成为秦楚之间的交通要道。汉代许多历史事件,因南阳交通系统的作用而发生。南阳和以南阳为枢纽的交通结构,曾经表现出特殊的历史意义。考察汉代交通史和汉代区域文化史,不能不重视南阳的交通地理形势。东汉以来,南阳的政治地位有所提升,交通作用也有所增强。随着南下移民浪潮的兴起,南阳作为四通的枢纽,联系南北的交通重心的地位愈益突出。诸葛亮择定南阳作为居所,以眼观天下,分析形势,等待时机,显然注意到南阳集中、交汇四方信息的优势,体现出不同凡响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战略眼光。

关键词:汉代;南阳;交通地理;诸葛亮;躬耕地

中图分类号:K232;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04)01-0001-08

南阳在汉代具有重要的交通地理地位。南阳和以南阳为枢纽的交通结构,曾经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考察汉代交通史和汉代区域文化史,不能不重视南阳的交通地理形势。东汉以来,南阳的地位更为突出。随着南下移民浪潮的兴起,南阳作为四通的枢纽,联系南北的交通重心的地位愈益显著。诸葛亮选择南阳作为居所,以眼观天下,分析形势,等待时机,显然注意到南阳集中、交汇四方信息的优势,体现出不同凡响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战略眼光。

一、武关道与南阳的交通地位

以南阳为一端,联系关中平原和江汉平原的武关道,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成为秦楚之间的交通要道。

《史记·秦本纪》记录了秦穆公以五羖羊皮赎还贤臣百里奚的故事:“五年,晋献公灭虞、虢,虢虞君与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马赂于虞故也。既虢百里奚,以为秦缪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缪公闻百里奚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使人谓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

羊皮赎之。’楚人遂许与之。当是时,百里奚年已七十余。缪公释其囚,与语国事。谢曰:‘臣亡国之臣,何足问!’缪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问,语三日,缪公大说,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虞国在今山西平陆北。百里奚“亡秦走宛”,很可能是计划由宛北上回乡。由此可以推知当时由今南阳地方通往秦地和洛阳方向的道路都是畅通的。

吴王阖闾和伍子胥伐楚,攻破楚都,《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楚大夫申包胥由武关道奔秦告急,“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左传·定公五年》载,秦师“五百乘以救楚”,败吴师。《史记·秦本纪》载:“(秦哀公)三十一年,吴王阖闾与伍子胥伐楚,楚王亡奔随,吴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来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于是秦乃发五百乘救楚,败吴师。吴师归,楚昭王乃得复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师”和秦军出援均经行武关道。秦昭襄王十二年(公元前295年),“予楚粟五万石”^[1](《秦本纪》),大约动用2000辆车,这次大规模的运输行动,也是通过武关道实现的。此外,秦楚之

收稿日期:2003-08-26

作者简介:王子今(1950-),男,河北武安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秦汉史。

间王族婚姻关系的缔结,双方“迎妇”,秦女东南行临江汉,楚女西北至于渭水,也都应当经由武关道。楚怀王人生悲剧的演出,武关道也是重要的舞台^①。陕西蓝田蓝桥河发现的古栈道遗迹,许多迹象表明,可能是先秦重要交通道路——武关道的遗存^②。

秦统一战争中,以强大军力控制了武关道,于是形成了对楚地的严重威胁。“(秦昭襄王)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错取軹及邓。……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邓。”秦军占据南阳地方,进一步打开了东进的通路。秦昭襄王二十二年,“与楚王会宛”。“二十四年,与楚王会鄢,又会穰”。“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穰”。“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③。“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④。宛,在今河南南阳。鄢,在今河南漯河西。穰、邓,在今河南邓州市。秦王政即位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秦王政)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⑤。在灭楚的战役中,秦军主力已经未必专行武关道^⑥。然而南阳交通四方的便利条件必然被充分利用。

秦始皇东巡,曾经多次经行这条道路。秦王政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秦王游至郢陈”;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东巡,“之衡山、南郡”,“上自南郡由武关归”;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行至云梦”^⑦。郢陈,在今河南淮阳。云梦,在今湖北潜江、沔阳一带。除了“自南郡由武关归”的明确记载外,“游至郢陈”以及“行至云梦”,也都可能由武关道而行,途经南阳。

秦末,陈胜起义军曾经有由南阳入武关进取关

中的计划,不过这一计划最终被挫败。《史记·陈涉世家》:“初,陈王至陈,令铤人宋留将兵定南阳,入武关。留已徇南阳,闻陈王死,南阳复为秦。宋留不能入武关,乃东至新蔡,遇秦军,宋留以军降秦。秦传留至咸阳,车裂留以徇。”刘邦军就是由这条道路先项羽入关的。在项羽与秦军主力艰苦相拒,血战中原时,刘邦却率军迂回经由南阳地区向西北进军,抢先控制了秦政权的重心地带。刘邦军在西向途中没有遭遇秦军主力,进取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后,缴获了充足的粮储,又从宛、武关、蓝田一线进军,兵锋直指关中。《史记·秦始皇本纪》:“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楚将沛公破秦军入武关,遂至霸上”。都记录了这一历史过程。据《史记·高祖本纪》,对于宛地的策略,因张良的建议有正确的择定。南阳守舍人陈恢请降时所谓“宛,大郡之都也”以及得宛则“足下通行无所累”等语,都说明了南阳的交通形势^⑧。

楚汉之争的最初发生,刘邦也有由武关而南阳的军事行动。《史记·高祖本纪》写道:“汉王用韩信之计”北定关中之后,“令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因王陵兵南阳,以迎太公、吕后于沛”。关于王陵在武关道和南阳的活动,裴驥《集解》:“如淳曰:‘王陵亦聚党数千人,居南阳。’”又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王陵故城在商州上洛县南三十一里。《荆州记》云:昔汉高祖入秦,王陵起兵丹水以应之,此城王陵所筑,因名。’”刘邦军在荥阳被项羽军击败,退回关中休整之后再次东进,其主力选择了由武关道进军南阳的路线。《史记·高祖本纪》:“汉王之出荥阳入关,收兵欲复东。袁生说汉王曰:‘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未晚也。如

① 《史记·楚世家》:“秦昭王遗楚王书曰:‘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驩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壤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唯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怀王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驩心!’于是往会秦昭王。昭王许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不与亢礼。楚怀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怀王亡逃归,秦觉之,遣楚道,怀王恐,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赵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与秦使复之秦。怀王遂发病。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又《屈原贾生列传》:“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② 《史记·货殖列传》:“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所说事相近,而年代有异。

③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说,“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王翦出征,也有“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的情节。这里所说的“关”,很可能是指函谷关。

④ 《史记·高祖本纪》:“与南阳守战犨东,破之。略南阳郡,南阳守蒯越,保城守宛。沛公引兵过而西。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道还,更旗帜,黎明,围宛城三匝。南阳守欲自刭。其舍人陈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见沛公,曰:‘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今足下尽日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随足下后;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后又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为殷侯,封陈恢千户。引兵西,无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繆、襄侯王陵降西陵。还攻胡阳,遇番君别将梅鋗,与皆降析、郦。”“因袭攻武关,破之。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南,益张疑兵旗帜,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喜,秦军解,因大破之。又战其北,大破之。乘胜,遂破之。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

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复与之战,破楚必矣。’汉王从其计,出军宛叶间,与黥布行收兵。”关于楚汉在南阳作战的情形,司马迁记述:“项羽闻汉王在宛,果引兵南。汉王坚壁不与战。是时彭越渡睢水,与项声、薛公战下邳,彭越大破楚军。项羽乃引兵东击彭越。汉王亦引兵北军成皋。”

吴楚七国之乱爆发,汉景帝任用周亚夫为太尉,作为最高统帅,往东方平定叛乱。《汉书·周亚夫传》记载:“亚夫既发,至霸上,赵涉遮说亚夫曰:‘将军东诛吴楚,胜则宗庙安,不胜则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亚夫下车,礼而问之。涉曰:‘吴王素富,怀辑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间人于殽阨陬之间。且兵事上神密,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计。至洛阳,使吏搜殽阨间,果得吴伏兵。”周亚夫从武关道前往洛阳,是出于“兵事上神密”的考虑,以致“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周亚夫所行,与百里奚“亡秦走宛”选择的路线是大体一致的。周亚夫用赵涉计经武关道东行的故事还告诉我们,从长安出发,“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与通常经行“殽阨间”的路线相比,“间不过差一二日”。可知当时南阳通往长安和洛阳的道路,通行状况都十分便利。南阳作为重要交通枢纽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谋反,曾经有“发南阳兵守武关”的计划。又《史记·货殖列传》:“南阳西通武关、郢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也都可以说明南阳与武关道的特殊关系,其优越的交通形势显然也受到司马迁的重视。《汉书·地理志下》也写道:“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会也。”可见,南阳的繁荣,是以优越的交通地理因素为重要条件的。除了控制武关道交通而外,所谓“东南受汉、江、淮”,“东受江、淮”所记述南阳与东方和东南方向地域的交通关系,也值得重视。

司马迁曾经强调南阳地方“商贾”的作用^①。

《汉书·地理志下》所谓“南阳好商贾”,正是因交通优势而形成的经济特征。南阳这一特殊的交通地理条件,在两汉之际尤为突出。至于东汉时期,随着其政治地位的上升,南阳地方交通作用的增强也是十分显著的。

二、东汉南阳政治地位的提升和交通作用的增强

王莽专政时期,曾经有将行政中心向东方迁移的意图^②。这一决策,其实是适应了全国经济文化重心逐渐东移的形势的^③。

据《汉书·王莽传中》,王莽“分三辅为六尉郡,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为六尉郡,置大夫,职如太守”^④,南阳被看作特别行政区域。又《汉书·食货志下》:“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南阳又被看作具有特殊地位的经济都市。其“南都”地位的形成,已经预示此后南阳将作为中原地区与江南地区交通的重要联系点。

翟义起兵时,王莽除发七将军率军镇压外,又以重兵屯卫战略要地,其中南阳是防卫的重心。《汉书·翟义传》记载,翟义兵起,王莽大惧,“乃拜其党亲轻车将军成武侯孙建为奋武将军,光禄勋成都侯王邑为虎牙将军,明义侯王骏为强弩将军,春王城门校尉王况为震威将军,宗伯忠孝侯刘宏为奋冲将军,中少府建威侯王昌为中坚将军,中郎将震羌侯窦兄为奋威将军,凡七人,自择除关西人为校尉军吏,将关东甲卒,发奔命以击义焉。复以太仆武让为积弩将军屯函谷关,将作大匠蒙乡侯遂并为横野将军屯武关,羲和红休侯刘歆为扬武将军屯宛,太保后丞丞阳侯甄邯为大将军屯霸上,常乡侯王恽为车骑将军屯平乐馆,骑都尉王晏为建威将军屯城北,城门校尉赵恢为城门将军,皆勒兵自备”。屯军

① 《史记·货殖列传》:“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

② 王莽始建国四年(12年),曾经公开宣布:周王朝有东都、西都之居。现今受命,仍旧遵照周代制度,其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于是洛阳已经具有了与常安(长安)相并列的地位。第二年,王莽又策划迁都于洛阳,也就是以洛阳取代长安,使其成为惟一的正式国都。这一决定,曾经一时在长安引起民心浮动,据史书记载,当时,长安城中百姓听说王莽准备迁都洛阳,不肯修缮房屋,甚至有的不惜将住宅拆毁。王莽于是借口以符命为根据,预定在三年之后,即始建国八年,正式迁都洛阳。宣布在此之前,西都常安(长安)的城市建设,不能受到影响。不过,历史上却没有出现所谓“始建国八年”,在第二年,王莽就决定改元为“天凤”。天凤元年(14年)正月,王莽又宣示天下,要从二月起“行巡狩之礼”。这一“巡狩之礼”,将完成东巡、南巡、西巡、北巡,在北巡之礼完毕之后,就要将政治重心转移到“土中”,正式定居于“洛阳之都”了。也就是说,原定迁都于洛阳的时间表又将大大提前。王莽“一岁四巡”的计划被大臣们以为不可行而提出反对。王莽于是又推迟了迁都洛阳的计划,迁都计划预定将在公元21年正式实施。由于民众起义的迅速爆发和蔓延,王莽以洛阳为都的预定计划没有能够真正落实。但是洛阳的地位在这一时期仍然在上升。当时人对于严重威胁新莽政权的民间武装暴动,称作“百姓怨恨,盗贼并起”,“欲动秦、洛阳”。地皇三年(22年),在起义军威势日益壮大的情况下,王莽发军征抚东方,又以洛阳作为主要的指挥中心与后勤基地。在当时非常的战争形势下,实际上洛阳已经被赋予仅次于长安的另一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王莽的东都规划虽然并没有能够完全实现,但是仍然是东汉定都洛阳初步奠定了根基,为此后全国经济重心和政治文化重心的东移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参看王子今:《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中国政治通史》第3卷,泰山出版社2003年8月版)。

③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李贤注:“王莽置六尉,郡置大夫一人,职如太守。南阳为前队,河内为后队,颍川为左队,弘农为右队,河东为兆队,荥阳为折队。”

7处,4处在关中。其余除函谷关外,即武关与宛。由此可见王莽对南阳地方的重视。“横野将军屯武关”,“扬武将军屯宛”,动机正在扼守武关道。可知南阳地位之重要,主要基于交通条件的考虑。《汉书·王莽传下》所谓“析人邓晔、于匡起兵南乡百余人,时析宰将兵数千屯鄢亭,备武关”^①,也说明了同样的情形。

范曄在《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论中,说到东汉前期“功臣专任”^②、“南阳多显”^③的政治现象。所列“功臣之次”,32人中,竟有13人出身于南阳地方。这些刘秀政治军事集团的中坚,其中有些本身就是豪族,或者和豪族的关系相当密切。例如:刘隆“南阳安众侯宗室也”^④(《刘隆传》),李通“世以货殖著姓”、“居家富逸,为闾里雄”^⑤(《李通传》),邓禹“豪赡”^⑥(《李王邓来列传》赞),任光“为乡啬夫”、“冠服鲜明”^⑦(卷646引《东观汉记》),吴汉“所至皆交结豪杰”^⑧(《吴汉传》),都反映了这样的历史事实^⑨(P186~187)。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世以货殖著姓”“所至皆交结豪杰”这些与交通行为有关的职业特征和个性特征。

刘秀及其政权的统治阶层本来就属于豪强地主集团,当政后凭借其政治权势,更为变本加厉地搜括土地,占夺人口。《后汉书·刘隆传》记载,因检核垦田数而发生了中央政府和河南、南阳地方豪强地主集团的矛盾。当时,天下垦田多不如实统计,又户口年纪也互有增减,豪强地主以所控制耕地和人口的虚假数字,对抗中央政府的经济管理。建武十五年(39年),汉光武帝刘秀颁布诏书,下令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能公正执法,豪右之家依然得到优遇,当时官场有所谓“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的说法,这正是因为“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可见南阳在当时居于仅次于首都的特殊地位。

体现南阳地区交通条件的资料,有东汉诸帝多以南阳为出巡目的地,多次临幸南阳的历史记录。

刘秀平定天下后,建武十七年(41年),“夏四月乙卯,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辅、楚公英、东海公阳、济南公康、东平公苍从,幸颍川,进幸叶、章陵。五月乙卯,车驾还宫”。十九年(43年),“秋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阳,进幸汝南南顿县舍,置酒会,赐吏人,复南

顿田租岁。父老前叩头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识知寺舍,每来辄加厚恩,愿赐复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复一日,安敢远期十岁乎?’吏人又言:‘陛下实惜之,何言谦也?’帝大笑,复增一岁。进幸淮阳、梁、沛”^④(《光武帝纪下》)。

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闰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阳,祠章陵。日北至,又祠旧宅。礼毕,召校官弟子作雅乐,奏鹿鸣,帝自御埴簠和之,以娱嘉宾。还,幸南顿,劳飧三老、官属。冬十一月,征淮阳王延会平舆,征沛王辅会睢阳。十二月甲午,车驾还宫”^⑤(《明帝纪》)。汉章帝元和元年(84年)八月,“丁酉,南巡狩,诏所经道上,郡县无得设储峙。命司空自将徒支柱桥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当坐。其赐鬴、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九月)辛丑,幸章陵,祠旧宅园庙,见宗室故人,赏赐各有差。冬十月己未,进幸江陵,诏庐江太守祠南岳,又诏长沙、零陵太守祠长沙定王、舂陵节侯、郁林府君。还,幸宛。十一月己丑,车驾还宫,赐从者各有差”^⑥。汉和帝永元十五年(103年),“九月壬午,南巡狩,清河王庆、济北王寿、河间王开并从。赐所过二千石长吏以下、三老、官属及民百年者钱布,各有差。是秋,四州雨水。冬十月戊申,幸章陵,祠旧宅。癸丑,祠园庙,会宗室于旧庐,劳赐作乐。戊午,进幸云梦,临汉水而还。十一月甲申,车驾还宫”^⑦(《和帝纪》)。

据《后汉书·崔骃传》:“元和中,肃宗始修古礼,巡狩方岳。骃上四巡颂以称汉德,辞甚典美,文多故不载。”《东汉文纪》卷一〇记录了其《南巡颂序》:“建初九年,秋谷始登,犹斯嘉时,举先王之大礼,假于章陵,遂南巡楚路,临江川以望衡山,顾九嶷,叹虞舜之风。是时庶绩咸熙,罔可黜陟,惟休蒸之鸿德,允天覆而无遗,壮云行之,博惠淑雨,施于庶黎。”

张衡名作《南都赋》也有关于“真人南巡”的辞句:“于是乎颍齿眉寿,鲐背之叟,皤皤然被黄发者,喟然相与歌曰:‘望翠华兮葭蕤,建太常兮徘徊。飞龙兮騑騑,振和鸾兮京师。总万乘兮徘徊,按平路兮来归。’岂不思天子南巡之辞者哉!遂作颂曰:皇祖止焉,光武起焉。据彼河洛,统四海焉。本枝百世,位天子焉。永世克孝,怀桑梓焉。真人南巡,

① 颜师古注:“析,南阳之县。南乡,析县之乡名。”

② 李贤注引《郑兴传》曰:“(郑)兴征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则人位谬矣。’”

③ 李贤注引《郭伋传》曰:“光武以(郭)伋为并州牧,帝引见,伋因言:‘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也。’帝深纳其言。”

④ 《后汉书·章帝纪》。章和元年(87年)又一次“南巡狩”,却没有至于南阳,其实是“东巡狩”及“东南巡狩”:“八月癸酉,南巡狩。壬午,遣使者祠昭灵后于小黄园。甲申,征任城王尚会睢阳。戊子,幸梁。己丑,遣使祠沛高原庙,丰粉榆社。乙未,幸沛,祠献王陵,征会东海王政。乙未晦,日有食之。九月庚子,幸彭城,东海王政、沛王定、任城王尚皆从。辛亥,幸寿春。……己未,幸汝阴。冬十月丙子,车驾还宫。”

睹旧里焉。”^①所谓“总万乘兮徘徊,按平路兮来归”,可以作交通史料读。

显然,南阳交通条件必须具备可以频繁通过皇帝乘舆车队的能力。通过所谓“诏所经道上,郡县无得设储峙”以及“命司空自将徒支柱桥梁”等,可知皇帝巡临南阳,当会促进这一地区交通设施建设优越于其他地方。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春二月，钜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帅有三十六方，皆著黄巾，同日反叛。安平、甘陵人各执其王以应之。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将兵屯都亭。置八关都尉官”。据李贤注，“八关谓函谷、广城、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小平津、孟津也”^[4]（《灵帝纪》）。“八关”中的伊阙关、大谷关、轘辕关都在洛阳南面，可知洛阳与南阳间的交通受到特殊的重视。

《南巡颂序》所谓“假于章陵，遂南巡楚路”，说明了南阳交通与其他地区交通系统的关系。南阳与其他地方的交通关联，还可以通过南阳商业的繁荣和南阳商人的活跃得到体现。司马迁关于“夏”地和“宛”地风习，有“好农而重民”，“加以商贾”的评价，又说：“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1]（《货殖列传》）班固对南阳的重商风习也有记录。他说，南阳“其俗夸奢”，“好商贾”，汉宣帝时，召信臣为南阳太守，“信臣劝民农桑，去末归本，郡以殷富”。于是又有“南阳好商贾，召父富以本业”的赞叹^[7]（《地理志下》）。其实，东汉以来，南阳“好商贾”的乡土风习更为炽盛。张衡《南都赋》所说当地“宝利珍怪”，应是南阳输出的主要商品：“其宝利珍怪，则金彩玉璞，随珠夜光。铜锡铅锴，赭堊流黄。绿碧紫英，青腹丹粟。太一余粮，中黄馥玉。松子神陂，赤灵解角。”

反映南阳商运状况的比较突出的史例，又有贾复从事盐运经营的故事。《后汉书·贾复传》记述南阳冠军人贾复事迹：“王莽末，为县掾，迎盐河东，会遇盗贼，等比十余人皆放散其盐，复独完以还县，县中称其信。”贾复主持的“迎盐河东”事，应是政府行为，与一般民间贩运不同，但是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南阳与河东的交通联系。而张家山汉简说到的盐运“济汉”即很可能出产于河东的食盐满足汉水以南需求的运输活动^[8]，应当也是经过南阳地方的。

《后汉书·循吏列传·茨充》写道，卫飒任桂阳太守，以中原文化为基点移风易俗，“南阳茨充代飒为

桂阳，亦善其政，教民种植桑柘麻紵之属，劝令养蚕织屨，民得利益焉”。茨充的故事，可以说明南阳曾经是中原先进农耕技术向南方传布的中继站。

南阳在交通方面的显著作用，还突出体现于在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曾经成为南下移民运动的重要的转徙中心。

三、作为信息中心的南阳和诸葛亮的选择

两汉之际，中原兵争激烈，“民人流亡，百无一在”^[9]（《魏书·董卓传》注引《续汉书》），“小民流移”^[10]（《天文志上》），往往“避乱江南”^[4]（《循吏列传·任延》）。东汉时期，“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饥荒之余，人庶流迸，家户且尽”，其中往往有渡江而南者。永初初年实行“尤困乏者，徙置荆、扬孰郡，既省转运之费，且令百姓各安其所”的政策^[4]（《樊准传》）。通过所谓“令百姓各安其所”，可知流民向往的安身之地，亦即民间自发流移的大致方向，本来正是“荆、扬孰郡”。东汉末年剧烈的社会动乱再一次激起以江南为方向的流民运动。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中原人口向江南的移徙，是中国社会史、中国经济史和中国文化史的重大事变。

由“荆、扬”之说，可知中原士民南迁目的地有两个大略的区域方向，即：

1. 江汉平原—江南荆州地
2. 江淮平原—江南扬州地

我们可以根据《汉书·地理志》及《续汉书·郡国志》提供的资料，分析两汉分属“荆、扬”的丹阳等十数郡国户口的变化（见表1、表2）。

从表中数字可以看出，扬州地方有两个郡户口出现负增长，总的增长率也明显低于荆州地方。而豫章郡接受移民数量突出，户口增长率达502.56%和374.17%。户口增长率最为惊人的是零陵郡，达到906.47%和618.61%。长沙郡的488.58%和349.22%，桂阳郡的380.21%和220.41%，也显示增长迅速。户口的增长，自然有山地少数民族逐渐入籍成为编户的因素，但是更主要的来源是南下的中原移民。这一现象，通过户数增长超过口数增长的情形也可以得到反映。而南阳作为荆州最北的一郡，户口增长依然可观。最终以零陵郡、长沙郡、桂阳郡为定居地点的来自黄河流域的南下移民，其实应当都经过南阳郡，利用过南阳郡的交通条件，有些移民也可能曾经在南阳地方居留。南阳是经受移民浪潮冲击的南北交通要道上的枢纽，这里也很自然地成为联通各地的信息中心。

① 李善注：“《东观汉记》曰：光武征秦丰，幸旧宅。酈道元《水经注》曰：光武征秦丰，张衡以为真人南巡，观旧里焉。”

表1 荆州两汉户口变化表

元始二年			永和五年			增长率(%)	
郡国	户	口	郡国	户	口	户	口
南阳郡	359316	1942051	南阳郡	528551	2439618	47.10	25.62
江夏郡	56844	219218	江夏郡	58434	265464	2.79	21.10
南郡	125579	718540	南郡	162570	747604	29.46	4.04
长沙国	43470	235825	长沙郡	255854	1059372	488.58	349.22
桂阳郡	28119	156488	桂阳郡	135029	501403	380.21	220.41
零陵郡	21092	139378	零陵郡	212284	1001578	906.47	618.61
武陵郡	34177	185758	武陵郡	46672	250913	36.56	35.08
合计	668597	3597258		1399394	6265952	109.30	74.19

表2 扬州两汉户口变化表

元始二年			永和五年			增长率(%)	
郡国	户	口	郡国	户	口	户	口
丹扬郡	107541	405171	丹阳郡	136518	630545	26.95	55.62
九江郡	150052	780525	九江郡	89436	432426	-40.40	-44.60
庐江郡	124383	457333	庐江郡	101392	424683	-37.70	-33.22
六安国	38345	178616					
会稽郡	223038	1032604	吴郡	164164	700782	28.79	14.47
			会稽郡	123090	481196		
豫章郡	67462	351965	豫章郡	406496	1668906	502.56	374.17
合计	710821	3206214		1021096	4338538	43.65	35.32

《续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补引《帝王世纪》说：“昔汉永和五年，南阳户五十余万，汝南户四十余万，方之于今，三帝鼎足，不踰二郡，加有食禄复除之民，凶年饥疾之难，见可供役，裁若一郡。以一郡之人，供三帝之用，斯亦勤矣。”《续汉书·百官志五》刘昭注补引应劭《汉官》也说：“《前书·百官表》云，万户以上为令，万户以下为长。三边始孝武皇帝所开，县户数百而或为令。荆扬江南七郡，唯有临湘、南昌、吴三令尔。及南阳穰中，土沃民稠，四五万户而为长。”袁术在南阳时，据说“户口尚数十百万”^[4]（《袁术传》）。东汉末年，当天下纷乱之时，长安久已残破，河洛地区的文明积累亦大被摧毁，而南阳地区则相对安定，原有经济文化基础似乎大体保全。

《后汉书·刘虞传》记载：“朝廷幼冲，逼于董卓，远隔关塞”，“（刘虞）选掾右北平田畴、从事鲜于银

蒙险间行，奉使长安。献帝既思东归，见畴等大悦。时虞子和为侍中，因此遣和潜从武关出，告虞将兵来迎。道由南阳”。刘和离开长安的路线，是“潜从武关出”，“道由南阳”，说明这条交通道路相对安全，南阳局势亦相对稳定。吕布出关中，也选择了同样的路线，“走出武关，奔南阳”^[4]（《吕布传》）。

当时南阳的交通形势，据《续汉书·郡国志四》刘昭注补引《荆州记》：“襄阳旧楚之北津，从襄阳渡江，经南阳，出方关，是周、郑、晋、卫之道，其东津经江夏，出平皋关，是通陈、蔡、齐、宋之道。”如果说，洛阳为“天下之中”^①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则南阳或许实际上又形成了新的“天下之中”。这一变化，其实是和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的历史趋向一致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南阳“三方是通”^②的优势更为突出，而作为信息积聚中心的特点，也为明智

①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史记·货殖列传》：“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在于土中”。

② 张衡《南都赋》：“尔其地势，则武阙关其西，桐柏揭其东。流沧浪而为隍，廓方城而为墉。汤谷涌其后，清水荡其胸。推淮引濉，三方是通。”李善注：“三方，东西及南也。”

之士所注重。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关于诸葛亮定居南阳事,有这样的记载:“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自己“躬耕于南阳”。时诸葛亮15岁以上,方届青壮之年,应正是雄心勃发时^①。诸葛亮定居南阳,有观察形势、等待时机的用心。即《全唐文》卷300严从《拟三国名臣赞序》所谓“孔明躬耕南阳,盘桓俟主”。

诸葛亮十分重视信息的采集和分析。传其所著《便宜十六策》第三即为《视听》,就是专门讲述一切相关情报信息的收集的。其中所说“务于多闻”,“察微形,听细声”,除强调体察下情外,也包含关注多方面信息的意思。有人说,诸葛亮当时的心理是“苟全性命”,“不求闻达”^[9](《蜀书·诸葛亮传》),如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8“诸葛公”条就写道:“使无徐庶之言、玄德之三顾,则苟全性命,不求闻达必矣。”然而其真实情形,可能未必如此^[11]。《卧龙岗志》卷2阎兴邦《重建南阳卧龙岗诸葛亮书院碑记》写道,诸葛亮所谓躬耕南阳,抱膝长啸,“比之耕莘钓渭者,先后一辙”,其说至确。

正是因为诸葛亮对利用南阳交通条件所获取的政治军事信息的整理和分析,使得他能够对于天下大势了然于心。著名的“草庐对”,就体现出诸葛亮的战略胸怀:“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

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9](《蜀书·诸葛亮传》)这种对于总体军事政治形势的全面认识,对于各地域形势、各军事集团实力及其领袖人物才具性格的真切了解,绝非单纯“躬耕陇亩”“抱膝长啸”者能够闭门自思所得。近年有学者对《草庐对》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提出异议^{[11][12]},然而其中体现的战略思想的价值却无疑是可贵的。诸葛亮身居南阳而了解天下大局,如果没有借助便利的交通条件而形成的信息渠道,是不可想象的。诸葛亮之所以能够“识时务”^[9](《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是基于他“对天下大势的周密考虑和分析”。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他始终留意着时局的变化,并针对变化有自己的策略”。“他的《草庐对》所以能一鸣惊人,正在于他综合了各种信息,深刻地把握了天下大势,从而提出正确的应对办法”。论者还指出,“在诸葛亮隐居荆州的时候,在他的周围有一个名士群”,“这些人大多是从各地避难而来”,于是形成了特殊的“消息来源渠道”^[13]。诸葛亮躬耕南阳,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信息的充分占有应当是主要因素之一。

诸葛亮在南阳与汝南孟建等俱游学,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载:“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裴松之则写道:“臣松之以为《魏略》此言,谓诸葛亮为公威计者可也,若谓兼为己言,可谓未达其心矣。老氏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贤达之流,固必兼而有焉。以诸葛亮之鉴识,岂能自审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定于其始矣。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质魏氏,展其器能,诚非陈长文、司马仲达所能颉颃,而况于余哉!苟不患功业不就,道之不行,虽志恢宇宙而终不北向者,盖以权御已移,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岂其区区利在边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谓‘鹄鵬已翔于辽廓,而罗者犹视于藪泽’者矣。”^[14]。诸葛亮所言,则表露“遨游”四方之志。然而裴松之却以狭隘意境理解诸葛亮“中国饶士大夫”句,似乎此言“谓诸葛亮为公威计者可也,若谓兼为己言,可谓未达其心矣”,说以诸葛亮才具,在“中国”亦必闪闪光耀,“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质魏氏,展其器能,诚非陈长文、司马仲达所能颉颃,而

① 明天一阁刻本《诸葛武侯文集》附《诸葛忠武侯年谱》、清人梁章钜《诸葛公年谱》将诸葛玄将诸葛亮及弟之官及往依刘表,玄卒,诸葛亮遂寓南阳襄、邓间事均系于“乙亥兴平二年,公年十五岁”句下。明人杨时伟《诸葛忠武侯年谱》、清人张鹏翮《诸葛武侯年表》则说,“侯寓襄、邓,当在此年以后”。

况于余哉”！诸葛亮“终不北向”，只是由于“权御已移，汉祚将倾”，志在“兴微继绝克复”，“岂其区区利在边鄙而已乎”！裴松之有将诸葛亮政治抱负理想化的倾向，其所谓“边鄙”，不知是指巴蜀，还是兼称南阳。如果以为东汉末年的南阳地方是“边鄙”，显然是历史人文地理的误识。孟建所归乡里在汝南，汝南与南阳相邻，似乎不可说汝南就是“中国”，而南阳竟是“边鄙”。

关于诸葛亮择定居地的考虑，有学者强调当地政局稳定，于是“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有所发展”的条件。其实，交通条件也是不宜忽略的重要因素。事实上，正如诸葛亮所说，荆州地势“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是有交通优势的。由所谓“北据汉、沔”可知，这里所说的“荆州”，指荆州总体地域，主要是南阳及其以南地方，而南阳的交通地理形势，显然有更优越的条件。

[参 考 文 献]

-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王子今,焦南峰.古武关道栈道遗迹调查简报[J].考古与文物,1986,(2).
- [3]王子今.西汉末年洛阳的地位和王莽的东都规划[J].河洛史志,1995,(4).
- [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5]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6]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 [7]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8]王子今.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见盐政史料[J].文史,2002,(4).
- [9]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0]司马彪.续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1]何景强.对诸葛亮的两点新认识[J].惠州大学学报,1995,(1).
- [12]屈玉堂.诸葛亮新论[J].许昌师专学报,1995,(3).
- [13]王大良.“三顾茅庐”和《草庐对》献疑[J].南都学坛,1995,(3).
- [14]王子今.秦汉人的乡土意识[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7,(1).

[责任编辑:刘太祥]

On the Geographical Situation of Traffic of Nanyang in Han Dynasty —Also about Strategic Selecting That ZHUGE Liang Cultivated Personally WANG Zi-jin

(History Dep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Nanyang's geographical position was very important in Han Dynasty. Nanyang & its network of communication lines, which showed specific historic meanings. From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political position of Nanyang had been promoted, its traffic function had been strengthened. The position as a hub of communications was becoming more & more outstanding along with the immigrant upsurge was in the making. ZHUGE liang had sharp eyes & keen ears, analysed the situation, chose Nanyang as the inhabited place, awaited a favourable opportunity, which embodied his strategic eyes as an outstanding statesman & strategist.

Key words: Han Dynasty; Nanyang; traffic geography; ZHUGE Liang

[会 讯]

全国“诸葛亮与南阳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南阳召开

2003年10月12~14日,“诸葛亮与南阳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南阳市召开。会议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南阳师范学院和南阳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陕西、湖北、山东、四川、河北、江苏、甘肃、湖南及河南等地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13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学术讨论,收到学术论文80篇。与会代表围绕诸葛亮躬耕地问题、诸葛亮与南阳、《草庐对》与《隆中对》篇目的定名、诸葛亮文化现象等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广泛交流。多数专家学者认为,汉代南阳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发达的文化、繁荣的社会经济为诸葛亮躬耕南阳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诸葛亮的躬耕地只能在“陪京之南,汉水之阳”,不可能在襄阳隆中。

(晓晨)

论诸葛亮躬耕“陪京之南,居汉之阳”说

王建中

(南阳诸葛亮研究会,河南 南阳 473000)

摘要:公元197~207年,是诸葛亮自表“躬耕于南阳”的十年。此时的南阳(郡),无论是《汉书》、《后汉书》、《晋书》,还是《襄阳记》,都无一例外的认为在“汉(水)以北”(习凿齿语)。所以,诸葛亮所说的“躬耕于南阳”,只能是躬耕于汉水以北之南阳,也就是习凿齿所说的“诸葛亮在南阳”。当时的南阳(郡),是全国第一大郡,在“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张衡语),不可能在“汉之阴”,即“现在湖北襄阳一带”。“草庐对”较之“隆中对”,更加符合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实际和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载。

关键词:诸葛亮;躬耕;汉水以北;南阳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04)01-0009-06

据襄樊媒体报道,自改革开放以来,襄樊有关方面把解决诸葛亮躬耕地及刘、亮对话的篇名问题一直摆在高于跑项目、跑经费的位置之上,并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学术研究活动及其他活动^[1]。活动的结果,襄樊确实收到了近十几年来,甚至近几百年来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前所未有的“效果”,那就是一批专家“一致认为”“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隆中”^[2],刘、亮对话的篇名应为“隆中对”,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加盖公章,以示“盖棺定论”。最近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专家,将这些意见融入三年制初级中学语文教科书第六册的《出师表》和《隆中对》中,旨在通过中国九年制义务教育,使“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就不会再有襄阳、南阳之争”^[1]的历史公案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南阳宛人大声疾呼:“为什么南阳人在诸葛亮问题上总是慢半拍。”^[3]本文认为这恰恰是“早半拍”所致。所谓“早半拍”,就是南阳人在南、襄两地的之争中,总是把诸葛亮自己所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以及刘备“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4](《诸葛亮传》)作为“躬耕地”和“草庐对”的铁证,没有把后来的一些人汇编的“诸葛亮后传”及其“后传”所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和刘备“三顾臣于隆中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看成一回事,任其挑战,

任其作为。结果,闹出了出乎南阳人意料之外的新问题,那就是在初中语文课本第六册诸葛亮的《出师表》中,将“南阳”注释为“南阳,郡名,在现在湖北襄阳一带”。将《隆中对》中的“隆中”注释为“隆中,山名,在现在的湖北襄樊”^[5](这条注释本身也是错误的)。

针对似是而非的“南阳郡”和似对非对的“隆中对”注释,持“南阳说”的专家认为,这决不是“襄阳说”天空中的“蘑菇祥云”,而是自己给自己又招来了一个新的链条麻烦。它只能说明:要突破诸葛亮所说的“南阳”和“草庐”是何等的困难。愈是这样,南阳愈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真探讨诸葛亮在公元197~207年到底在哪里躬耕。

二

据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及同时期其他史籍记载,东汉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至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诸葛亮曾有十年躬耕的历史。

(一)诸葛亮躬耕的背景

上述《诸葛亮传》云,亮父名诸葛珪,字君贡,汉末为泰山郡丞。亮早年失去父亲,由叔父诸葛玄抚养长大成人。诸葛玄曾被袁术任为豫章(南昌)太守。后因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遂携亮及弟均投靠素与自己有交往的荆州牧刘表门下。陈寿《进诸葛亮集表》亦有亮“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句。“玄卒,亮躬耕陇亩”。玄卒于何因,《三国志》作

收稿日期:2003-10-19

作者简介:王建中(1944-),男,汉族,南阳市人,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秘书长,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副秘书长,南阳诸葛亮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楚汉文化和诸葛亮文化。

者没有进一步说明,按《传》文推定,当为病亡。

然刘艾《献帝春秋》所载的玄卒与本传不同。《献帝春秋》云:“初,豫章太守周术病卒,刘表上诸葛亮玄为豫章太守,治南昌。汉朝闻周术死,遣朱皓代玄。皓从扬州太守刘繇处求兵击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杀玄。送首诣繇。”^[6](《诸葛亮传》注引《献帝春秋》)

从刘艾的记载里可以看出,对于诸葛玄的死因、地点,陈、刘所述有较大的分歧。本文从陈寿说,即“玄卒”,卒于荆州“谓为信然”。

(二)诸葛亮躬耕的时间

《三国志·诸葛亮传》云:“玄卒,亮躬耕陇亩”。可见玄死的时间,就是诸葛亮躬耕生活的始端。遗憾的是《传》并没有说清“玄卒”的具体时间,这样,诸葛亮躬耕生活的开始时间就只有靠推算了。

其一,见于郑天挺主编的《三国志选·诸葛亮传》引《献帝春秋》:“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杀玄。”

其二,见于《诸葛亮集·故事》刘艾《献帝春秋》:“建安四年正月,西城民反,杀玄。”^[7](《故事》注引刘艾《献帝春秋》)

其三,见于《诸葛氏谱》:“珪生二子,长瑾,次亮,次均。珪与妻章氏相继卒,三子俱叔玄抚养。”“玄死时,瑾年十三,亮年八岁。”^[7](《故事》注引刘艾《献帝春秋》)

其四,《资治通鉴》:“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刘繇使豫章太守朱皓攻袁术所用太守诸葛玄”,时亮15岁。

本文从郑天挺主编《诸葛亮传》裴注《献帝春秋》说,即诸葛亮始耕于东汉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时年17岁。如对“建安二年”说持有不同意见,亦不为怪。

关于诸葛亮结束躬耕生活的记载较为明确。陈寿《进诸葛亮集表》云:“魏武帝南征荆州,刘琮举州委质,而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此系诸葛亮走出躬耕之地随备南行之年,故可知诸葛亮的躬耕生活结束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

在陈寿作《三国志》后约130余年,刘宋文帝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亦持建安十二年说。裴云:“刘备以建安十三年败,遣亮使吴,亮以建兴五年(公元227年)抗表北伐,自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则备始与亮相遇,在败军之前一年时也。”^[6](《诸葛亮传》裴松之按)此“时”即为建安十二年。

通过上述推算和文献记载可知,诸葛亮在叔父诸葛玄去世后,便开始了公元197~207十年躬耕陇亩的布衣生活。

(三)诸葛亮躬耕的形象

《三国志·诸葛亮传》云,亮“身長八尺”。“汉大一尺当清营造七寸二分,今市尺六寸九分,合零点二三公尺;八尺约当清营造尺五尺七寸多,今市尺

五尺五寸多,合一点八四公尺。”^[6](《诸葛亮传》裴注)由此可知诸葛亮是一员山东大汉。

陈寿《进诸葛亮集表》,不仅再次记载了诸葛亮的身世,而且还描述了他的具体形象:“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7]

《姓源韵谱》载:“诸葛亮身長八尺,形细面粗,犹如松柏,皮肤枯槁,文理润泽。”^[7](《故事》注引《姓源韵谱》)此书记载的诸葛亮身高与陈寿所述的一致。而“形细面粗”,“皮肤枯槁”一类记载虽具农夫形象,然与寿记载的“容貌甚伟”相异,故不从之。

(四)诸葛亮躬耕的地点

关于这个问题,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的一清二楚,且十分肯定。他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遗憾的是他没有往下说到“县、乡、里”。由于上表出师之年是三国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所以,这是诸葛亮回忆“二十又一年”前发生于东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前的旧事。

公元207年前的南阳,即南阳郡和南郡同是一处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政区。《史记·秦本纪》载,秦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六年以后,即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秦置南阳郡”。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天下分为36郡,南郡和南阳郡均居其一。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示,南郡辖江陵、郢等6县;南阳郡辖宛、邓等14县。

汉承秦置。据《汉书·地理志》载,西汉时的南郡领18县,其中有襄阳、中庐等县;南阳郡领36县,其中有宛、邓等县。两郡同隶属于荆州刺史部。

东汉时,南郡、南阳两郡都基本上承袭了西汉时的行政区划,同时加大了州级的权力。据《后汉书·郡国志》云,东汉时,南郡辖17城,其中有襄阳、中庐等县。南阳郡辖37城,其中有宛、邓、随、比阳、鲁阳、析县、丹水、武当等县。也就是说东汉时的南阳郡因是光武皇帝刘秀起兵立国的故乡,新增一县,与西汉时的汝南郡并列为辖37县的大郡。郡治宛,其范围如张衡所云,在“陪京之南,居汉之阳”,也就是北起鲁阳县(今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南达邓县(今湖北樊城以北),东起比阳县(今河南驻马店市泌阳县),西达丹水县(今河南淅川县境内),西南则达武当县(今湖北丹江市境内),东南则至随县(今湖北随州市),面积近4万平方公里,“户五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比汝南郡户多12万,口多33万,实为全国第一大郡。

面对山水相依、土地相连的南南两郡和襄邓两县,汉水成了两郡、两县(特指襄阳与邓县)两县间划界的主要依据。《晋书·地理志》在记述荆州时云:“六国时,其地为楚,及秦,取楚鄢郢国为南郡。又取巫中地为黔中郡,以楚之汉(水)北立南阳郡。”

东晋习凿齿《襄阳记》亦云:“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自汉以南为南郡。”

值得一提的是“汉魏六朝的中庐县既不在今南漳县的东北,也不在今襄阳县南或西南,而当在今襄阳市西30里泥嘴镇西的翟家垭子附近”^[8]。如是,南阳郡的邓县不仅与襄阳隔汉水相望,而且与仅距襄阳15公里的中庐县亦隔汉水相望。如果说在汉水上游出现有南阳郡过汉水,辖汉水以南本属于南阳郡所辖的县、邑的情况,惟有在这里不能出现南阳郡邓县,辖本不属于南阳郡辖属的襄阳、中庐两县的情况,更没有理由出现南阳郡邓县过汉水辖襄(阳)中(庐)两县之间,时称阿头山,一说汉皋山、方山的情况。即使当时中庐县不在泥嘴镇西的翟家垭子,而在现在的南漳县,建安十二年前,也没有一条南阳郡邓县过汉水辖南郡襄阳县西13公里阿头山或方山的史料。因此《晋书·地理志》和东晋习凿齿《襄阳记》所说的以楚之汉水南立南郡,以楚之汉水北立南阳郡的“汉水天然分界说”是推不翻的。故可以肯定地说诸葛亮所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只能在“汉水以北南阳郡内”^[9]或者说“必在汉水以北之南阳”^[10]。

(五)诸葛亮与刘备对话的篇名

《三国志·诸葛亮传》云,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时,刘备屯新野。徐庶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并说道:“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刘备“三往”于何处,《诸葛亮传》中没有记载。“乃见”于何室,《诸葛亮传》中亦没有记载。根据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自表的躬耕地点,“三往”,“乃见”的地点当与诸葛亮躬耕的地点应是一致的。故以地点定名,应将刘、亮对话的文章定名为“南阳对”。

但是,诸葛亮在回顾这一往事时,并没有将先主的“凡三往,乃见”,重复为三顾臣于“南阳”之中,而是表述为三顾臣于“草庐”之中。陈寿《进诸葛亮集表》在表述这一往事时亦云:“时右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因此,将刘、亮对话的篇名或曰诸葛亮对策,终定为“草庐对”,不仅符合诸葛亮在南阳躬耕的实际和陈寿的各种记载,而且特具浓郁的乡土气息。

(六)诸葛亮躬耕期间的其他活动

1. 喜欢歌唱“梁父吟”^[4]。“梁父吟”,又作《梁甫吟》,古歌谣名。全文:“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2. 与崔州平、徐元直关系“友善”^[4]。《三国志·蜀志·董和传》诸葛亮云:“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

3. 关羽、张飞对刘、亮“情好日密”,“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

君勿复言。’羽、飞乃止。”^[4]

4. 刘表长子刘琦“亦深器亮”。刘琦每次请亮给自己谋划“自安之术”,都遭到亮的拒绝。于是“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去梯,因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4]。

5. 随备出走于“曹公来征”。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4](《武帝纪》)。“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4]

综上所述,可将诸葛亮在公元197~207的躬耕档案概述如下:

诸葛亮字孔明,生于公元181年,早年失去父亲,由其叔父诸葛玄抚养成人。亮身高1.84米,长得非常英俊。公元197年,其叔父“玄卒”后,亮便离开荆州襄阳之家,到汉水以北之“南阳”开始了“躬耕陇亩”或者“躬耕于野”的布衣生活。其间,在自己简陋的“草庐”里与“凡三往,乃见”的先主进行了可兴“汉室”的“草庐”对话,并与先主建立了“情好日密”的关系。公元207年,诸葛亮结束了十年躬耕的艰苦生活,“遂许先帝以驱驰”。公元208年,曹公“南征”时亮随先主南行,从此,走上了辅佐先主与后主旨在“兴复汉室”的道路。

三

说到《三国志·诸葛亮传》我们就不能不研究作者一番。《晋书·陈寿传》云,陈寿,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四川南充)人,生于蜀汉后主建兴十一年(公元233年)即诸葛亮死前一年,卒于晋惠帝元康七年(公元297年)即蜀汉亡国后34年,与蜀汉有31年的并存历史。蜀汉灭亡前(公元263年),陈寿曾出任蜀汉之国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职,有条件涉足蜀汉的历史,更有条件接触诸葛亮的后代子孙。加之寿少时受同郡史学家谯周的影响,“聪警敏识,属文富艳”,有著书立说的良好基础。但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这样,在陈寿撰写《三国志》蜀志前就缺少一部如王沈《魏书》,韦昭《吴书》,鱼豢《魏略》等的私家国史参考。不过,寿在被晋王朝起用前,对蜀国材料,殷勤搜集,向来留意^[6](《说明》),已具撰史条件。被晋王朝选用后,曾奉中书监和中书令之命“定故丞相诸葛亮故事”。在平阳侯相任上撰成《诸葛亮集》。三国复归统一(公元280年)后,他开始整理三国史事,“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14](《陈寿传》)。

《晋书·陈寿传》在肯定《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11](《陈寿传》)的同时,云陈寿父曾

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受连带责任,亦受一种被剃去头发的刑罚。亮子瞻又瞧不起陈寿。陈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11](《陈寿传》)。并由此怀疑陈寿《诸葛亮传》的真实性。事实是陈寿在作《诸葛亮传》时,在史料的取舍上,是经过谨慎斟酌的。关于刘备与诸葛亮最初相识的经过,《魏略》与《九州春秋》都说是诸葛亮主动去见刘备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陈寿不取此说,而根据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自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所以记此事时说:“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6](《说明》)再如诸葛亮躬耕的地点问题。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只说到“躬耕于南阳”,没有往下说到县、乡、里。因此,陈寿在为亮作传时,在肯定“躬耕于南阳”的同时,谨慎地使用了“玄卒,亮躬耕陇亩”的提法。而在《进诸葛亮集表》中使用了“躬耕于野”的字眼。可见陈寿对《诸葛亮传》的记述是“剪裁斟酌处,亦自有下笔不苟者,参订他书,而后知其矜慎”^[6](《说明》)。

寿死后,晋惠帝“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14](《陈寿传》)。因此,陈寿的《诸葛亮传》可谓是三国末、西晋初的“诸葛亮前传”,亦即“天下第一传”。他在《传》中所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以及“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谄臣以当世之事”亦即“天下第一笔”。

四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即诸葛亮走出草庐,结束躬耕生活的第二年,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的南郡和南阳郡,其政治、经济、军事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影响深远,甚至造成南襄两地诸葛亮躬耕地之争近两千年不解的,就是曹操关于南襄两郡之间的重新划界。这本是一件与诸葛亮躬耕生活毫无干系的另篇,但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襄阳郡起到了模糊南南两郡的分界,混淆诸葛亮自表躬耕的地点,以及改变陈寿《诸葛亮传》真实历史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本文就不得不走出诸葛亮在公元197~207年,谈谈诸葛亮“后传”的行政区划及其他一些问题。

《晋书·地理志》载:“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魏武尽得荆州之地。分南郡以北为襄阳郡”,“统县八”,邓县、襄阳为其一。从此,南南(阳)两郡被一分为三,即被分为南郡、襄阳郡和南阳郡三郡。襄邓两县间的汉水自此失去了长达500年的天然分界作用^[10]。汉水失去南南两郡的天然分界作用后,要求中国历史地图的绘制应与《晋书·地理志》保持一致。然而,《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三国魏荆州”,把东汉时隶属于南阳郡,三国魏时隶属于襄阳郡的邓县仍画在汉水以北南阳郡内^[12]显然是不符合《晋书·地理志》记载的,是需要再版时修订

的。在同一幅地图上,把西晋时出现的“隆中”,画在“三国魏荆州”襄阳郡内,也是不符合王隐《蜀记》记载的,因此,也是需要再版时修订的。而《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东汉荆州刺史部”所标示的南南郡界,襄邓县界,以及阿头山的位置都是依《后汉书·郡国志》等绘制的,都是画得很清楚的,而不是“画得不太清楚”;是没有任何差错的,而不是“是有差错的”;是需要再版时重申的,而不是“以后再版时要修改”^[13]的。

正是由于曹魏襄阳郡的建立,改变了汉水在南南(阳)两郡、襄邓两县中的分界作用,使诸葛亮躬耕地的隶属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为了拨乱反正,以正视听,诸葛亮在走出草庐20年后,自表了当年在南阳,即汉水以北之南阳躬耕陇亩的历史。遗憾的是蜀“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这段经历并没有载入当时蜀国史册,而早于陈寿《三国志》的《魏书》、《吴书》、以及《魏略》,也都没有涉足这一问题。这样,诸葛亮所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谄臣以当世之事”,以及陈寿在《诸葛亮传》里所记载的亮“躬耕陇亩”、“躬耕于野”便成了自诸葛亮躬耕之年(公元197年),至陈寿故去之年(公元297年)整整100年间无人挑战,又无文争辩的历史档案。

五

然而,在陈寿故去之后,有关诸葛亮的材料就渐多了起来。至东晋南北朝,南、襄、南(阳)三郡的行政区划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正史、野史、民间传说并存,寓居地、躬耕地、纪念地真假难辨^[12],诸葛亮躬耕地之争由此始矣,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两说。

(一)王隐“隆中”说。晋永兴(公元304~305年)中,镇南将军襄阳郡守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之远望,弑诸葛之故乡。”^[6](《诸葛亮传》注引)《晋书·李密传》云,刘弘镇襄阳,密子兴“在弘府,弘立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兴俱为之文,甚有辞理”大抵指的就是此文。此文又见于王隐《蜀记》。《晋书·王隐传》云:“王隐,字处叔,陈郡陈人也。世寒素。父铨,历阳令。少好学,有著述之志。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未就而卒。”由此可知,隐为西晋后期、东晋前期人。东晋元帝(公元317~322年)时任著作郎,“令撰晋史”。“受父遗业”,“乃得成”。但不知何故,王隐传中并未有其撰《蜀记》之记载。依王隐《蜀记》之记载,刘弘观亮故宅的前提是在“沔之阳”,即在汉水以北。因此,“隆山”,即隆起之山;“隆中”,即隆起的山中;故宅,即诸葛亮过去居住过的地方,有可能全部发生在汉水以北南阳某个地方。

退一步而论,即使刘弘的观亮活动发生于“沔

之阴”,李兴和王隐也都没有说清“隆山”和“隆中”的具体方位。现在已知的是东汉时,襄阳有阿头山之记载。《后汉书·冯岑贾列传》云:“(岑)彭乃潜兵渡沔水,击其将张扬于阿头山,大破之。”唐李贤注曰:“沔水源出武都东狼谷中,即汉水之上源也。阿头山在襄阳也。”西晋时,襄阳附近只有岷、方二山。《晋书·刘弘传》云,刘弘为镇南将军前,荆襄一带百姓的生活非常痛苦,按照当地的“旧制,岷、方二山泽中不听百姓捕鱼”。刘弘都督荆州诸军事后,要求立即改变这一束缚生产发展,影响百姓生活的“此法”。《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岷山,一名岷首山。在今湖北襄樊市南。”方山,又名万山。《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万山,一名方山,蔓山、汉皋山。在今湖北襄樊市西北汉江南岸。”既然西晋时襄阳有方山,假若方山之中有亮故宅,那么,李兴陪刘弘观亮故宅,就不应该作“登隆山以远望”之文,而应该作“登方山以远望”之文。假如方山之中没有亮故宅,那么,就只能理解为西晋时“隆山”的位置是一处有待进一步考证的地方了^[14]。

(二)习凿齿“隆中”说。《三国志·诸葛亮传》:“玄卒,亮躬耕陇亩。”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如果说西晋时刘弘登隆山,观亮故宅,没有说清“隆山”、“故宅”的具体方位,王隐撰《蜀记》也没有进一步说清“隆中”具体方位的话,那么,在诸葛亮走出南阳草庐约160年,即东晋废帝(公元366~370年)期间,“凿齿在(荥阳)郡,著《汉晋春秋》”^[11](《习凿齿传》),说清了“隆中”的具体方位。由此链接了“隆山”的具体方位,并由此拉近了“故宅”与“家”之间的关系。在习凿齿已注明亮家在“城西”的同时,习在罢郡归襄,致桓温弟秘的书中又进一步肯定了“隆中”的相对位置。书中云,习“每定省舅家,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北临樊墟存邓老之高,南眷城邑怀羊公之风……慨尔而泣”^[11](《习凿齿传》)。东晋太和五年(公元370年)以后,习凿齿又为诸葛武侯故宅作铭,云:“躬耕西亩,永啸东岵。”^[7](《习凿齿《诸葛武侯宅铭》》)至此,习凿齿作完了诸葛亮和陈寿均没有作完的躬耕地详细地址的文章。这样,诸葛亮的《出师表》就可以改写为:“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隆中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陈寿的《诸葛亮传》就可以改写为“玄卒,亮躬耕于隆中”。《进诸葛亮集表》,就可以改写为亮“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隆中,不求闻达”等新篇。

尽管习凿齿提出了诸葛亮躬耕地的详细地址,但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矛盾。

一是把诸葛亮躬耕地定位于汉水以南之隆中,

与其自己所著的《襄阳记》记载的“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自汉以南为南郡”^[15]的说法矛盾。

二是把诸葛亮家定位于南阳之邓县,与其《襄阳记》记载的“襄阳有孔明故宅”^[7](卷5《遗迹篇》)的说法矛盾。

三是把“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定位于襄阳城西与东,与其《襄阳记》所记载的“孔明在南阳,与(襄阳)县庞德公素有重名”^[7](卷2《遗事篇》)的说法矛盾。

四是《汉晋春秋》所说的“号曰隆中”的“号”字,应理解为“扬言”,“宣称”,未必真实。如《史记·高祖本纪》:“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

由此可知,习凿齿杜撰的诸葛亮躬耕“隆中”说,并没有真正填补陈寿《诸葛亮传》关于躬耕地的“县、乡、里”空白。

不过,习凿齿所说的“隆中”,还是应该认真进行一番考察的。本文认为,此“隆中”有三种可能。

其一为诸葛亮寓居地。即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说的“初,琅邪诸葛亮寓居隆中”之家,即习凿齿在《襄阳记》中所说的“襄阳(非南阳之邓县,笔者注)有孔明故宅”^[7](卷5《遗迹篇》)。详细地址,即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所说的“在襄阳城西二十里”。

其二为诸葛亮纪念地。陈寿《诸葛亮传》云:“景耀六年(公元263年),诏为亮立庙于沔阳。”^[4]习凿齿《襄阳记》:“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7](向充,习隆:《为诸葛丞相请立庙表》润案)襄阳作为诸葛亮随叔父至荆州的第一站,在亮病故后为其私祭则顺理成章。需要提及的是东晋时期,定都建康,偏安一隅,与蜀汉相似。所以,襄阳人和东晋王朝官员一般以蜀汉为正统,寻诸葛亮事迹,立诸葛亮祠庙不是没有可能。从习凿齿记载的诸葛亮“故宅”,“葛井”,“避暑台”和“乐山”看,已明显具有纪念建筑物的性质。例如,《襄阳记》云:“襄阳(为何不云邓县,笔者注)有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广五尺,曰葛井,堂前三间屋地,基址极高,云是避暑台。宅西面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瑟为梁甫吟,因名此为乐山。”^[7](卷5《遗迹篇》)

其三为董家故宅。习凿齿《襄阳记》云,“襄阳有孔明故宅”。“嗣有董家居此宅,衰殄灭亡,后人不敢复憩焉”^[7](卷5《遗迹篇》)。连接西晋王隐《蜀记》晋永兴(公元304~305年)中,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健为李兴为文曰:“夸我来思,魏尔故墟”之记载可知,不管诸葛亮故宅在汉水以北,还是在汉水以南,刘弘所看到的都非诸葛亮“故宅”,而是诸葛亮“故墟”。依习所说,若诸葛亮走出隆中后,亮宅先由董家居住,董家人灭绝后,后人不敢在此歇息,此宅遂人去宅废,那么,刘弘至隆中所看到的,只能是董家故墟,由于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并未提及这一房地遗产,陈寿、王隐也都没有

涉及此事,所以,习凿齿所说的“亮宅董居”说不知有何根据。

在诸葛亮走出草庐约220年后,刘宋文帝命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裴注引用了习凿齿亮家“隆中”说。

在诸葛亮走出草庐约320年后,北魏酈道元作《水经注》。酈亦引用了习凿齿亮家“隆中”说,并注明此宅为先帝三顾处,刘弘观亮故宅处,习凿齿为其宅铭处。

至此,“诸葛亮后传”达到了日臻完善的程度。唐、宋、元、明、清至今,虽然“隆中”说屡有翻新,但始终没有超出习凿齿的原版。

六

由于习凿齿的“隆中”说,晚于诸葛亮的“南阳”说,亦晚于陈寿的“躬耕陇亩”说和“躬耕于野”说,其方位又与“南阳”南辕北辙,且时间相差160余年以上,因此断言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就是“躬耕于隆中”;先主“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就是先主“三顾臣于隆中之中”,显然是不符合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历史档案的,为“隆中”说盖棺定论更是违背党的“双百”方针的错误作法。

尽管躬耕地的问题,南襄两地存在很大分歧,但将诸葛亮的《出师表》和与刘备的对话,选入中学

语文课本,是件绝好的事情,本身是没有任何疑义的,问题在于如何为《出师表》中的“南阳”作注释,为刘、亮对话的文章定篇名。鉴于诸葛亮躬耕地已有近两千年的不同理解,或曰争论的历史,给学生的教育就不能采取“一边倒”的政策。相反,应努力避免将这一历史公案,引入“九年义务制教育”,使我们的后代走进莫衷一是的学术争论之中。及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关于《出师表》中“南阳”的注释:南阳,东汉郡名,隶属于荆州刺史部,辖三十七县,治所宛,在今河南省南阳市一带。

(二)关于刘备与诸葛亮对话的篇名拟为“草庐对”,有以下几种注释方法:

(1)草庐对。节选自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题目是后加的。

(2)草庐对。取自《三国志·诸葛亮传》:“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题目是后加的。

(3)草庐对。晋代以后亦称“隆中对”,取自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诸葛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4)草庐对。节选自清张澍《诸葛亮集》“草庐对”。

[参 考 文 献]

- [1]隆中对“复出”的背后[N].襄樊晚报,2003-07-18.
- [2]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行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专家论证会的结论意见[A].丁宝斋主编.诸葛亮躬耕何处[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 [3]宛人.四十多年前的南阳武侯祠和襄樊隆中[N].南阳晚报,2003-08-08.
- [4]陈寿.三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5]相关链接[N].南阳晚报,2003-08-08.
- [6]郑天挺主编.三国志选[C].北京:中华书局,1962.
- [7]诸葛亮集[C].北京:中华书局,1960.
- [8]古郾、维、涑水及宜城、中庐、郢县故址新探[A].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 [9]李兆钧,王建中.秦汉南(阳)两郡分界的地理学研究[N].南阳日报,1996-07-04.
- [10]李兆钧,王建中.再论秦汉时期南郡与南阳郡的分界[N].南阳日报,1997-10-02.
- [11]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2]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M].北京: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社,1975.
- [13]谭其骧论诸葛亮躬耕地[A].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C].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
- [14]王建中.“镇南将军”“宣成公”刘弘墓的发现及其意义[A].丁宝斋主编.诸葛亮成才之路[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 [15]秦会要订补·名胜志[M].引习凿齿《襄阳记》.

[责任编辑:刘太祥]

The Place where ZHUGE Liang cultivated personally lies to “the South of Secondary Capital, the North of Han River”

WANG Jian-zhong

(Nany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ZHUGE liang, Nanyang Henan 473000, China)

Abstract: ZHUGE liang made known himself “cultivate personally in Nanyang” from A.D. 197-207. At that time, not only *Han shu*, *Hou Han Sha*, *Jin Shu*, but also *Xiangyang Ji*, all thought that Nanyang lies to “the north of Han River (XI Jiao-chi’s Saying).” Nanyang was the largest prefecture all over the country at that time. It lies “to the south of secondary capital, the north of Han River (ZHANG Heng’s Saying)”. It’s impossible that Nanyang lies to “the south of Han River”, that is “the area of Xiangyang in Hubei.” So we think that “Caolu Dui” tally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 CHEN Shou’s account in “*San Guo Zhi · ZHUGE liang Zhuan*”.

Key words: ZHUGE liang; cultivate personally; Nanyang to the north of Han River

诸葛草庐南阳襄阳之争的形成和发展

张晓刚

(南阳市博物馆,河南 南阳 473000)

摘要:关于诸葛草庐所在地的争论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西晋时期未有人对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提出疑问。东晋南北朝时期有人称襄阳隆中有诸葛亮“故宅”、隆中隶属南阳郡邓县、隆中即为躬耕地,但因与古代文献中对秦汉时期南阳郡与南郡之间界标的记载相左,不能使人信服。唐宋时期南阳诸葛庐、南阳诸葛亮名扬天下,大量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受三顾于南阳。元明时期官修史书持南阳说。清代对诸葛草庐所在地众说纷纭。民国时期南襄两说并存。20世纪80年代末因发行“三顾茅庐”邮票而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旷日持久的争论。“教科书事件”使草庐之争再度升温。

关键词:诸葛草庐;南阳;襄阳;发展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04)01-0015-05

关于刘备三顾诸葛亮的草庐故址是在河南今南阳或是在今湖北襄樊的论争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然而,这一历史疑案究竟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呢?下面作一简要介绍。

一、西晋时期未有人对诸葛亮躬耕地提出疑问,从陈寿到李兴皆记述诸葛亮“躬耕于南阳”

关于诸葛亮躬耕受三顾地所在的最初记述是在蜀汉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在汉中(今陕西汉中)出师伐魏时上给后主刘禅的奏章《出师表》中:“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这是诸葛亮第一次透露自己20多年前躬耕受三顾处是在南阳。由于这段文字出自诸葛亮上给皇帝的奏章中,其真实性不可怀疑,因此后世研究诸葛亮躬耕受三顾处者均视为最原始、最可信的材料。

在诸葛亮死后第一个全面整理研究诸葛亮者为西晋史官陈寿。陈寿是益州巴西郡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生于诸葛亮病逝前一年(233年),曾在蜀汉政权中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入晋后在平阳侯相任内完成了《诸葛亮集》的编纂工作。他是西晋著名史学专家。他在所著《三国志·诸葛亮传》中除全文收录了诸葛亮的《出

师表》外,还分别写道:“(亮)遭汉末扰乱,随叔父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陈寿《三国志》以“简洁可信”著称,他对诸葛亮自述的躬耕受三顾事实及地点未提出任何疑义,对诸葛亮躬耕受三顾于南阳持肯定态度。

继陈寿之后,西晋时期涉及诸葛亮躬耕受三顾处的史料还有李兴的《祭诸葛丞相文》。李兴,又名安,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人,与陈寿是同学,因受父亲李密影响,对诸葛亮为人极为崇敬。曾任益州刺史罗尚的别驾。太安二年(303年),义阳蛮张昌在安陆一带聚众起义,北进南阳盆地,西晋朝廷命刘弘率官军前往镇压。永兴元年(304年)刘弘奉诏从幽州奔方城(今河南方城县),然后进至宛县(今河南南阳市中心城区)、新野(今河南新野县),经过反复较量,终于击败了张昌,以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的身份驻节宛。正在此时,李兴受罗尚之遣到宛刘弘处求救,弘留其任参军。也就在这期间,李兴为刘弘撰写了《祭诸葛丞相文》,文中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沔”指汉水,“沔之阳”,即指汉水以北,刘弘在沔北南阳举行祭

收稿日期:2003-10-20

作者简介:张晓刚(1958-),男,汉族,南阳市人,南阳诸葛亮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南阳市博物馆副馆长,主要从事三国文化研究。